

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

周 洲 等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論反对右傾机会主义

周 洲 王鳳賢 著
魏 桥 孙建华

※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 196 号

浙江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1号

地方国营杭州印刷厂印刷·浙江省新华书店发

※

32开 787×1092 1/32 印张 1 5/8 字数 39,000

1959年12月 第 一 版

1959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5,000

統一書号：T3103·334

定 价：(5)一角二分

目 次

一、党的正确路线是在和错误路线斗争中实现的·····	1
二、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就是企图为资本主义在我国 复辟开辟道路·····	8
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在政治路线上的表现·····	8
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在党的领导和党的团结问题 上的表现·····	20
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是我们当前政治战线和思 想战线上的首要任务·····	26
三、右倾机会主义产生的根源·····	28
右倾机会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	28
右倾机会主义产生的认识根源·····	33
四、彻底批判和克服右倾机会主义思想·····	43
坚决和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作斗争·····	43
怎样克服右倾机会主义思想·····	45

一、党的正确路线是在和错误路线斗争中实现的

我们的党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我们的党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善于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来解决我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重大问题。三十多年来，我们的党和毛主席正确地制定了民主革命的总路线、社会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这三条总路线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的典范，指导着我国革命运动从一个革命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革命阶段，取得了一个革命的胜利，接着又取得另一个革命的胜利。现在我国已经彻底地完成了民主革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我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是党的正确路线的胜利，是毛主席英明领导的胜利。

但是，正象一切新事物都是在和旧事物作斗争中生长壮大起来的一样，我们党的正确路线不仅是在和国内外的敌人作斗争中取得胜利的，而且也是在和党内的错误路线作斗争中实现的。我们党的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斗争，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大家知道，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消灭一切剥削阶级、一切剥削制度和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没有剥削和没有压迫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一切剥削阶级都是不甘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他们不仅公开反对革命，而且千方百计地从革命队伍特别是党的内部寻找代理人，力图改变我们

党的路綫、方針、政策。我們党又是处在一个小資产階級在人口中占优势的国家。小生产者是有者，又是劳动者。当他們还没有在工人階級领导下决心拋棄私有制、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的时候，他們要求消灭阻碍自己发展的旧制度，使自己发财致富，过得好一些。他們希望我們党滿足他們的这种私有的要求，他們也往往以自己的意識来影响我們党和革命队伍中的人。而我們的党虽然是一个偉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但是，也有一些人組織上入了党，思想上还没有入党，仍然存在着或者坚持原有的非无产階級的立場、观点和方法，这些人往往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用小資产階級或資产階級世界觀来改造我們的党，改造客觀世界。这样，社会上的階級斗争就会反映到我們的党内来，当我們党还不是很成熟的时候，那些存在着小資产階級或資产階級世界觀的人就可能把自己的小資产階級或資产階級的政治观点，发展成为“左”傾机会主义路綫或右傾机会主义路綫，甚至統治全党；而当我們党确立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正确領導以后，由于馬克思列宁主义已在党内占統治地位，那些存在着小資产階級或資产階級世界觀的人，虽然已不可能把自己的小資产階級或資产階級的政治观点发展成为統治全党的“左”傾或右傾路綫，但是，他們也往往从“左”或右的方面来抵制、反对党的正确路綫，提出“左”傾机会主义或右傾机会主义的观点和主張，甚至进行非組織的活动。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團結全党同志，粉碎了各个革命时期所出現的右傾机会主义路綫或“左”傾机会主义路綫，从而使中国革命沿着正确的道路向前发展，使一个革命胜利接着一个革命胜利。

由于各个时期的历史条件和任务之不同，因而在各个历史时期所出現的“左”傾机会主义和右傾机会主义都有不同的内容和表現。現在，讓我們簡略地回顧一下各个革命历史时期党内两条路綫斗争的情况。

解放前的旧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当时的主要矛盾是广大人民群众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代表它们利益的蒋介石反动派之间的矛盾。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推翻这代表三大敌人利益的蒋介石反动统治，完成民主革命。所以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总路线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右倾机会主义者不坚持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不了解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相互联系，在民主革命中看不到有把这个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的前途；而“左”倾机会主义者则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并企图在民主革命阶段内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不论右倾机会主义者或“左”倾机会主义者，他们都不懂得农民问题对我国革命事业的重要性，因此都不能正确地处理和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刘少奇同志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一文中指出：“右倾机会主义者对资产阶级采取投降主义的路线，把民主革命看成主要是资产阶级的事情。他们不去依靠工人和农民的联盟，而主要地依靠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并且对于资产阶级只进行联合，而不进行必要的斗争。……‘左’倾机会主义者不愿意联合各种小资产阶级群众和民族资产阶级，并且错误地把中间力量作为主要的打击方向，否认在民主革命中有联合或者中立各种中间力量的必要和可能。他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只进行斗争，不进行适当的联合，更不愿意利用敌人的具体矛盾，集中力量去反对最主要的敌人。结果也放棄了无产阶级领导权，使无产阶级陷于孤军作战，使革命不可能得到胜利。”“左”倾机会主义者和右倾机会主义者都忽视农民对革命事业的重要性，忽视了农民的利益和农民对革命的要求，因此在反动统治时期，他们都不承认革命必须经过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战略的正确性。在民主革命这段时期内，我们党内所出现的三次“左”倾机会主义和二次右倾机会

主义的錯誤路綫，比較集中地体现了上述“左”傾或右傾机会主义的規点。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出现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傾机会主义的錯誤路綫，这条路綫到1927年发展为投降主义，由于当时资产階級叛变革命，由于当时的反革命力量大大超过了革命力量，特别是由于当革命的紧要关头（一九二七年上半年）这条錯誤路綫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統治地位，因而使革命遭到失敗。在1927年到1937年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出现过三次“左”傾机会主义的錯誤路綫，其中特別严重的是1931年至1934年发生的王明路綫，这条“左”傾机会主义的錯誤路綫使革命遭到严重損失。1935年1月的遵义會議，确立了以毛澤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胜利地結束了“左”傾机会主义的錯誤路綫，并逐漸地彻底地糾正和克服了“左”傾路綫在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和思想上的种种影响。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局部地区党内又出现了以王明同志为代表的右傾机会主义的錯誤路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負責同志團結全党的同志，粉碎了“左”傾机会主义者和右傾机会主义者的錯誤路綫，貫徹执行了党的正确路綫，使中国革命沿着正确的道路向前发展，終于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国进入了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存在着社会主义經濟、资本主义經濟和个体經濟，与此相适应的有三种社会力量，即工人階級、资产階級和小资产階級（包括农民在內），而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工人階級和资产階級之間的矛盾，即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之間的矛盾。

在1953年当恢复国民經济和肃清封建殘余的任务基本完成之后，以毛澤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綫，即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同时并举的总路綫，規定了在全国范圍內，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

造，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党的这条总路线是引导中国社会由当时既有社会主义经济、又有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复杂的经济结构，过渡到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的路线。在这一时期内如果不去积极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加速国家工业化的进程；如果看不到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要求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或者看不到他们的小私有制正是产生自发资本主义因素的基础，必须加以改造、因而不去积极领导他们走合作化的道路；如果看不到资本主义工商业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看不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看不到资产阶级的本性就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不加强对私营工商业的限制、改造，并最后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把资本家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那就要发生各种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反之，如果看不到农民和手工业者是劳动者这一面，看不到他们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不采取逐步过渡的形式，不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企图用强迫和剥夺的办法来实行合作化；或者看不到在我国具体历史条件下，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当时对发展国民经济还有一些积极作用，看不到资产阶级可能接受和平改造，不用赎买的而用剥夺的办法来消灭资本主义，那就会发生各种“左”的错误。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到七年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且几乎完全没有引起什么破坏，工农业生产一直是上升的，这个伟大的胜利充分证明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但是，有些同志在某些问题上也曾经犯过“左”倾或者右倾的错误。例如，有的人否认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要性，幻想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有的人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采取“坚决收缩”的错误方针。在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有的人认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只应当加以利用，而不应当加以限制和改造，或者说

我們限制得過多，改造得太急了，也有的人認為我們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逐步改造，採取贖買政策，這“太妥協了”，他們主張在一個早上就把資本主義消滅得干干淨淨。黨中央和毛主席及時批判和克服了這些錯誤觀點，領導全黨和全國人民正確地貫徹執行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因此，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全面的勝利。

在經濟戰綫、政治戰綫和思想戰綫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取得了偉大的勝利以後，我國進入了以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為中心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1958年5月黨中央和毛主席及時制定了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這是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綫，它集中地反映了我國人民的意志和智慧，正確地反映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客觀規律。全國人民熱烈擁護和積極執行這條總路線，意氣風發，斗志昂揚，掀起了生產建設的高潮，並於1958年實現了農村人民公社化。可是，代表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利益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卻反對黨的總路線、反對大躍進、反對人民公社，刮起了一股“冷風”。在黨的八屆八中全會的號召下，全黨正在開展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並已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全國人民正高舉着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光榮旗幟勝利前進！

在簡略地回顧了我們黨歷史上兩條路綫鬥爭的情況以後，我們還需要指出一種情況：在一定條件下，“左”傾機會主義者和右傾機會主義者可以互相轉化，這除了他們都有着非無產階級的階級特性以外，還因為他們在思想方法上都存在主觀性、片面性、表面性。例如王明同志，他是我國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第三次“左”傾機會主義路綫的主要代表人，但到了抗日戰爭時期，他又成為右傾機會主義的主要代表人。在兩條路綫的鬥爭中，黨中央和毛主席不僅採取了“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的正確方針，而且善於根據每個時期的具體

情况，着重反对当时的“左”倾或者右倾的错误，同时又注意防止右倾或“左”倾错误的产生。因而我们党能够及时地正确地克服部分同志所犯的“左”倾或者右倾的错误，使全党同志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周围，沿着党的正确路线胜利前进。

我们党的极其光荣、伟大的斗争历史无可争辩地证明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的无比正确性，也深刻地教育我们：只有与错误路线和错误倾向不断斗争，才能坚持和发展党的正确路线，不断地取得革命和建设的新胜利，这是革命事业发展的规律。为了顺利地把我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在将来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继续坚持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克服一切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思想行为。在当前，我们就必须坚决批判和克服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红旗，坚持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光辉旗帜，为把我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

二、右傾机会主义的實質就是 企图为資本主义在我国复 辟开辟道路

1958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設全面大跃进的一年。1959年在1958年大跃进的基础上，我国社会主义建設事业又繼續跃进。

“大局很好，前途光明”，这是当前形势总的特點。

对于这样的大好形势，絕大多数干部和广大群众的認識是清楚的、正确的。他們說，1958年騎的是“千里馬”，1959年跨上了“万里龙”。因而他們干劲十足，信心百倍，从而又取得了1959年繼續大跃进的偉大胜利。但是，与此相反，在地平綫上出現了一股反社会主义的右傾机会主义思潮。一小撮右傾机会主义分子，附和着国内外敌对分子对于我們人民公社、大跃进和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誹謗，向群众和干部潑冷水，散布松勁、泄气、埋怨、悲觀的情緒，企图制造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混乱，借以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事业。在这些右傾机会主义分子所吹起的一股歪风的襲击下，一小部分政治上不堅定、有右傾情緒的人，經不起歪风恶浪的襲击，迷失了方向，发生了动摇。右傾机会主义分子的右傾思想、右傾活动，和一小部分干部中滋长着的右傾情緒，已經成了阻碍我們革命繼續前进的主要危險。因此，反对右傾机会主义就成了当前政治思想战綫上的一个重要任务。

右傾机会主义思想在政治路綫上的表現

当前我們党同右傾机会主义分子之間的政治分歧，集中表現

在坚持或者反对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問題上。党坚持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則反对这条总路綫。大家知道，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是我們党中央和毛主席創造性地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結合起来的产物，它反映了六亿多人民要求迅速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把我国建設成为一个幸福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迫切愿望和坚强决心，也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設事业向前发展的客觀規律。近两年来的偉大实践，鉄一般地証明了党的这条总路綫的万分正确和巨大威力。1958年我国国民經济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出現，以及1959年的繼續大跃进，都是全国人民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积极貫徹执行这条总路綫的結果。由于广大人民群众热烈地拥护党的总路綫，右傾机会主义分子也感到公开反对总路綫，就会一下子暴露出他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質。因而他們就采用“原則拥护，具体反对”的伎倆，在口头上有时也表示承認党的总路綫，在实际上却非难和攻击总路綫，把体现总路綫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污蔑为“小資产阶级的狂热性”。他們“原則上同意”社会主义，实际上向往資本主义。因此，在反对右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我們就必须彻底揭穿他們的右傾思想、右傾活动的反动本質，以达到教育、提高全体黨員和群众，坚决保卫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目的。

我們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本質，就是对于人民群众在建設社会主义事业中的覺悟性、积极性、創造性的高度重视，反映总路綫的本質的两个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大搞群众运动和高速度的問題。党中央和毛主席不仅認為革命斗争是人民群众自求解放的事业，需要通过偉大的群众运动才能取得彻底的胜利；而且坚定地相信人民群众又是新社会的建設者和創造者，認為人类社会的历史，归根到底是生产发展的历史，而劳动者則是生产力中最积

极的因素，因而坚决主張在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中要坚持大搞群众运动的方針。群众运动的規模越大，人民群众在生产过程中越自觉、越积极、越富于創造性，社会主义的建設就越能多快好省地向前发展，沒有規模巨大的群众运动，就沒有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建設。可是右傾机会主义者却拼命反对我們大搞群众运动。說什麼“革命可以搞群众运动，建設不能搞群众运动”；“农村可以搞群众运动，工业、財貿、文教部門不能搞群众运动”，說是在这些方面搞群众运动“会影响企业正常的秩序”，“会妨碍正規化生产”，“会影响教育質量”，等等。我国社会主义建設中，各个战綫上大搞群众运动的偉大成就，有力地駁斥了右傾机会主义分子的这些謬論，充分地証明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大搞群众运动指示的正确性。在生产建設战綫上，由于大搞群众运动，发动群众“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帮后进”，1958年我国出現了史无前例的大跃进，工农业总产值比1957年增加了六百亿元，比第一个五年計劃期間增长的工农业总产值还要多四十亿元；基本建設投資总额二百六十七亿元，建設完工和部分完工而投入生产的限額以上工业項目为七百个，增加的灌溉面积为四亿八千万亩，而第一个五年計劃期間，建設完工和部分完工而投入生产的限額以上工业項目为五百三十七个，增加的灌溉面积为二亿一千八百万亩。1959年我国国民經济又在1958年大跃进的基础上繼續跃进。在文化教育战綫上，由于大搞群众运动，貫徹执行了“教育为工人階級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結合，教育工作要由党来領導”以及“两条腿走路”的方針，我国的教育事业发生了深刻的革命，文化教育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并且教学质量也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些难道不能証明“生气勃勃的創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創立的”嗎？难道还不能証明党的領導和群众运动相結合是建設社会主义的根本方法嗎？难道这还不能說明工厂、农村以及一切有关广大群众利益的工作都需要而且可以搞群

众运动的嗎？当然，群众运动发展起来以后，是会要破坏一些原有的生产秩序和教学秩序的。但是，它所破坏的是不利于生产发展的旧秩序，是不利于提高教学质量、培养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旧制度，而在同时又建立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新秩序和有利于教学质量提高的新制度。拿生产秩序來說，在1958年，我們通过群众运动，在企业中調整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行了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实行了领导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員和管理人員几方面在党委领导下密切結合的制度，同时有领导地改革了不合理的制度，結果就大大地提高了企业的管理水平和领导水平。象这样的破旧立新有什么不好呢？刘少奇同志指出：“有领导地改变旧秩序，建立新秩序，就是充分发挥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要这样做，就要依靠人民群众，同一切束縛生产力发展的傳統的習慣势力作斗争，不断地調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使之适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只要我們这样做，就能够推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迅速发展，就能够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就能够保持国民經济的持續的跃进。”右傾机会主义分子說大搞群众运动会影响“企业的正常秩序”和“教育質量”，除了表明他們反对我們“破旧立新”的不断革命、死守那些陈腐的、落后的、反动的东西，阻碍社会主义建設事业迅速发展以外，还能說明什么呢？

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都是我們党领导的偉大的群众运动。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却污蔑这两个运动是“小資产階級狂热性运动”。小資产階級在不可忍受的被压迫被剝削的情况下，是可以表現为一时的、短暫的革命狂热的。这种狂热病的特征，就是在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在作风上的华而不实，脆而不坚，不顾实际可能的盲目蛮干；在政治上的动摇不定，时而狂热，时而消沉。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我国政治經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創造性地把馬克思列

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我国六亿五千万人民要求迅速地改变我国贫穷和落后面貌的一种伟大决心和伟大智慧的表现。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我国人民实现这种愿望创造了条件，使国民经济高速度地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有了可能性。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又必然要引起生产关系的相应的变革，要求我国把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改变为人民公社。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鼓舞下，广大人民斗志昂扬，意气风发，掀起了生产建设的高潮，开展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现在，我国的人民公社已走上了巩固地健康地发展的道路，生产和建设事业仍然以跃进的速度发展着。试问，人民群众的这种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创造性，我们党所领导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同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运动有何相同之点呢？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说：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了不少缺点，这不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所造成的吗？”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确曾经出现过某些难以避免的局部的个别的暂时的缺点，但是，和伟大的成绩比较起来，这只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或者还不到一个指头，而且早已克服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抓住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这两个伟大的群众运动中的一个指头的缺点不放，任意夸大，这和我们对待缺点和错误的严肃认真态度完全是两回事。我们党一贯抱着对人民利益高度负责的精神，要求党员和革命干部做好每一件工作，不出或少出缺点和错误，并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但是我们又是缺点和错误的难免论者。我们认为，革命和建设是发挥亿万人民群众的大力，创造翻天覆地的大业；革命者所面临的都是前无古人的新事业，对于这样的事业，不可能学好了再干，而只有干起来再学习，边干边学，而且又不能等到亿万群众对于党的方针政策都有完全正确的、一致的理解才进行，因而就难免要发生一些缺点和错误。大跃进和人民

公社化都是嶄新的事物，在开始組織国民經济大跃进和办人民公社的时候，干部和群众都缺乏經驗，因此产生一些缺点更是难免的。一切馬克思主义者对待缺点和錯誤的态度从来就是既严肃認真但又不大惊小怪，正如打仗一样，从战术上来看，对每一个具体战役要求必須只能打胜仗不能打败仗，但从战略意义来講，胜敗又是兵家之常事。更何况我們的事业根本就不是什么“敗”，而是极大的跃进，是我国建設史上从未有过的大胜利，那种要求群众运动不偏不倚，毕恭毕正，其实就等于取消群众运动。右傾机会主义分子之所以污蔑我們革命的群众运动是“小資產阶级的狂热运动”，就是誣蔑我們党已經犯下了“左”傾机会主义的路綫錯誤，就是要以他們那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路綫来代替党的正确的路綫。

总之，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就是党的群众路綫在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中的应用和發揮。党的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結合是建設社会主义的根本方法，是实现总路綫的根本方法，也是我們事业必然取得偉大胜利的根本保証。因此对革命群众运动的态度，是区别无产階級革命家和資產階級革命家、小資產階級革命家的重要标志，也是贊成或反对社会主义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試金石。无产階級革命家深信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是无穷的，放手发动群众，积极支持和領導群众的革命运动，以保証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实现。而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則是以資產階級老爷式的态度对待群众运动的。“資產階級当民众还是保守的时候，是不免要害怕民众愚鈍的，而在民众一旦变得革命的时候，却又要害怕民众觉悟了。”^①右傾机会主义分子也正是这样的，在群众沒有发动起来的时候，他們是“条件論”者，忽視群众的主觀能动作用，埋怨群众太“落后”；当群众发动起来之后，他們又“怕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第一卷第313頁